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九五”重点课题

杨继瑞 杨明洪/著

TRANSFORMATION
AGRICULTURE

农业增长方式
转型研究

GROWTH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年·成都

责任编辑:孙 英 魏 勇

责任校对:刘 梅

封面设计:邹小工

责任印制: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杨继瑞,杨明洪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5

ISBN 7-5614-2090-0

I. 农... II. ①杨...②杨... III. 农业经济-经济
增长-研究 IV. F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507 号

书名 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

作 者 杨继瑞 杨明洪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3.06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2 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5412526/5414115/
5412212 邮 政 编 码: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电话:5011398 502334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经过 22 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占世界 10%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1% 的人口，并支撑了整个国民经济平均以 9.6% 的速度增长，从而为农业、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使我国由一个农业大国逐步转变为一个农业强国。要实现由农业大国逐步转变为农业强国，必须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一是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长期形成的片面追求产品产量增长而忽视农产品质量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解决，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农产品需求约束中国农业发展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经营将无法形成有效供给，农民增收问题也难以解决，农村市场的启动也就缺乏必要的动力。二是解决中国农业如何适应对外开放需要的问题。加入 WTO 后，我国农业既要直面国外农业的竞争，又要走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三是解决如何将农业结构调整与推广应用适用农业技术和高新农业技术紧

2 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

密结合的问题。因为我国农业增长对农业科技的依赖越来越大,但我国农业科技的总体水平不高,农业科技和推广投入长期不足,难以支撑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四是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过去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对农业资源的保护重视不够,农业的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因而在强调农业发展的同时,重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注重对农业资源的保护,促进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五是解决农业劳动者素质问题。我国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下,而尤以农业劳动者为甚,解决农业劳动者素质既是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又是适应农业劳动者向农业以外转移的需要。

要解决上述问题,途径多种多样,但归结到一条,就是从战略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1996年,由杨继瑞同志主持的“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他和他的博士生杨明洪同志(现在在我校作博士后研究)共同完成了该研究项目,其最终成果为《农业增长方式转型问题的研究》。

该书以农业增长方式的基本理论为主题。该书认为,农业增长方式是实现农业长期稳定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源泉、增长机制及其路径;农业增长方式属于生产力范畴,可概括为主观和客观农业增长方式、微观和宏观农业增长方式;农业增长方式转型有时点和时序两类基本考察方法;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的内涵是农业增长由以依靠要素投入为主转向以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为主。随后,该书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农业增长方式在1949—1992年的运动特征,并运用农业增长方式范畴去阐释我国农业的发展规律。

该书从历史、现实及未来趋势系统地分析了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及有利条件,并提出了通过思想观念、科技发展方向、经济体制、农业组织形式、农业发展模式、农业发展环境、农业经营方式、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农业发展政策、农村社会等

十大转型来集成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框架。以此为基础，该书分别从农业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农业结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经济体制及农业国际化等六个方面探讨了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路径。该书认为，农业科技进步和积累人力资本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关键；农业结构调整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现实要求和重要途径；改革农业经济体制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同等重要，前者为后者提供体制条件。

该书还探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增长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指出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助于在高层面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最后，该书还就实现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有效结合点作了深入的探析，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最佳结合点。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际上，我以为就是重塑我国农业的发展机制。借这个机会，我想就我国农业发展提出以下问题供同志们研究和思考。

一个是农业结构调整问题。本书也谈到这一点。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喊调整农业结构，可是收效就是甚微。这是什么问题？我以为，现在农业结构调整缺乏一个合理的价格机制。因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而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所以，没有合理的价格机制，就难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现在主要农产品已经供大于求，而仍在大量生产这些劣质产品，缺乏一种市场淘汰机制；另一方面，生产优质产品的动力又严重不足。价格在其中的杠杆作用完全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价格的功能发挥不出来呢？主要是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体系还未健全起来。因此，我以为，政府在抓结构调整的时候，还必须更新思路，不要简单地作诸如在播种面积上下功夫，而应着力在理顺品种与质量差价关系上找突破口。

4 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

另一个是提高农民素质问题。俗话说，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农村，农村的问题就在于农民，而农民的问题就是农民素质不高。这种说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试想，历史已把人类推进到新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的发展还能依靠“一根扁担、一头牛、一双手”吗？国家已经提出：中国农业的未来就是实现农业大方向农业强国转变。我们依靠什么去实现农业强国？有人说，关键是我们农民人口多。我则认为，人口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我国农民素质低下。该书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论述了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性及其途径，这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一个是农产品加工问题。记得杨继瑞同志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出版了《中国乡镇企业论》。那时，我就注意到中国乡镇企业的产业取向与城市趋同。不过，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在以市场供求关系严重紧张的形势下进行的。因此，乡镇企业的产业取向与城市趋同有一定的合理性。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市场供给关系急转直下，乡镇企业发展面对的形势严重起来。另一方面，小农户进入正在日益贯通的大市场也困难重重。通过改革流通体制农业产业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既为乡镇企业实现“二次创业”找到突破口，又为“小农户”进入“大市场”提供了有效的载体。

刘诗白

2001 年 5 月

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提出

1995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了自1995年以后15年的奋斗目标，并指出，实现这一个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改革经济体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同步推进，相辅相成，这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为什么“九五”时期要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第一，从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

2 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

的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效益低下。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1953—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6.1%，1978—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但从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看，1953—1980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22倍，而国民收入仅增加5.1倍；1981—1995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83倍，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12.37倍，实现利、税仅增加2.7倍。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1980年为25.2%，1993年下降到10.3%；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1980年为25.8元，1993年下降到15.2元。“八五”时期每100元总投资仅新增国民生产总值50元左右。这说明经济建设必须从追求产值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第二，企业技术装备落后，科技进步缓慢。中国企业的技术装备大多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工业企业设备近1/5老化，超期服役率达40%。机电行业中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平的只占1/3，达到目前世界先进水平的只占5%，冶金工业中大部分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10~20年以上。利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法计算结果，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十四届五中全会（1995年），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72%，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28%。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则占到60%~80%甚至更高。这说明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科技进步缓慢。因而，必须将中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第三，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与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同时并存。棉、毛纺工业生产设备利用率只有75%，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卷烟、汽车和普通机械等工业生产能力闲置1/3或1/2。但各个地方仍热衷于搞基本建设、铺新摊子、上新项目，造成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

过剩。工业中的这种“热衷主义”盛行，势必挤压农业，造成农业长期投入不足，而对农业投入不足反过来又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基础地位不巩固和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导致农村市场打不开，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加上，各地方热衷于搞“价高利大”的一般加工工业，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其结果必然是基础产业部门对一般加工工业的限制作用越来越大。这样，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极不协调，处于一个非良性循环之中。这些都说明，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讲求增长的质量，做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四，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低下。长期以来强调高投入，其结果是低产出，国有企业亏损日趋严重。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1992年为22.7%，1993年为29.3%，1994年为32.7%，1995年为33.5%。1995年预算内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50亿元，比1994年增长近20%。国家每年把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的70%以上投到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实现的GNP增量在全部GNP增量中不足20%。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量的货币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十四届五中全会以前的高通货膨胀的深层次矛盾就是这种高投入、低产出增长方式的一个典型的例证。经济过热与过冷交替出现，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说明，必须从源头上寻找治理国民经济发展“过热—过冷”病的办法，即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五，国际竞争力低下，难以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改革开放把我国引上国际竞争的舞台。从国际竞争的发展态势来看，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国际竞争的关键是科技竞争，因为经济总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科技水平。科技进步是提高国民经济质量和素质的关键。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数来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诸如煤、谷物、棉花、钢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从科技水平来看，中国目前仍处于世界的后

4 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

列，产品价高质差，且人均占有量也非常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科技发展速度加快，人类业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已初见端倪。高科技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也迅速成长起来。这对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来讲，中国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为了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是其必然选择。

总结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当前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深层上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的战略举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须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步推进，才能实现国民经济跨世纪发展的战略任务。当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其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了有利的体制条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相伴而行的。既然经济体制逐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那么，这种体制的转轨同时也为增长方式的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二，改革与发展使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整个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型逐步向需求约束型转变。这一转变的积极意义在于，热衷于铺摊子、上新项目而搞一般加工型项目，最终要受到市场需求约束的惩罚；同时也使一些企业更加重视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手段，以效益为中心”。市场企业经营模式也正在需求约束中逐步形成。

（二）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知历程

从政府的角度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而人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知则要早得多，可以追

溯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因而可以认为，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①

其一，1956 年，中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了增长质量与增长方式问题。在其《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两文中，孙冶方列举了当时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中存在的种种高浪费、低效率现象，并对问题的症结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他说：“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企业的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落后的、中间和先进的企业为了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水准而不断进行的竞争，也就是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大道。”他进而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通过同一行业内的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像一条无情的鞭子，督促着生产的进步；同时，价格的不断涨落引导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流动，执行着分配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实现供求平衡。可见，“现在我们的计划统计指标着重于实物量，而忽视了价值，着重于表现生产的成果（所谓“总产量”，即毛产额），而不着重于分析这成果的内容如何，更不着重分析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达到增加物质财富的最后目的”。“对资本家来说，生产不计财务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国，‘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应有的气魄。”“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行事的经济政策和经济

^① 进一步的论述请参见，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1 期；王保安：《中国经济增长与方式的变革》，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5～79 页。

6 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

计划，到头来就是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观主义者强调计划，它的结果只是使计划脱离了实际。”孙治方先生在作出这些精辟分析以后，提出了救治的药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用以“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①。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建议并未对当时中国经济决策产生多少影响，尽管他的观点得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赞同。

其二，在前苏联，1928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一直采取主要依靠动员和增加投入的办法推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及战后初期经济的迅猛增长，但这种增长给人民带来的实惠并不多，而且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总是有限的，到1958年之后，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面对这种情况，前苏联的经济学家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讨论扩大再生产形式时的提示，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前苏联经济增长现实。在他们的理论中，有了“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理论分析工具。针对前苏联现实存在的问题，实现外延增长方式向内涵增长方式转变被提出来作为克服前苏联经济增长缺陷的救治办法。而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又必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于是就有了1962年的“利别尔曼建议”和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前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讨论和“柯西金改革”在中国也激起了一定程度的回响。学术界对“无形磨损”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激烈的讨论，而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也试图通过制定《工业七十条》、“组织托拉斯”和改革流通体制等办法，来增强企业经济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但60年代中期以后，也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保持传统体制下的“试图”也一度中断了。

^① 孙治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其三，被“文化大革命”打断的“试图”，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1979—1980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了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对外经济关系和理论与方法等四个研究小组，集中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这四个研究小组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我国过去数十年间采取了一种依靠铺新摊子、用高投入支持高速度的增长方式，增长率虽不低，但却缺乏实效。所以，在制定“五五”计划和1980—1990年十年规划时，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实现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与此同时，当时不少人已经看到，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要转变增长方式，就必须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认识上了新台阶的标志。这一时期，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①对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做了全面的论述。刘国光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②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这两大转变之间的依存关系也做了透彻的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体现在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中。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上述思想，对后来中国经济政策 and 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1年中共党代会关于在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期间要处理好质量差、物质消耗高及经济效益低的痼疾，必须既坚定不移又慎重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力争在199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上奠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

①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研究

制等规定，正是上述基本思路的继续与展开。

其四，在 1989—1990 年期间，又一次就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进行了大辩论。当时人们对 80 年代后期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的经济根源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即“经济结构不良、经济效益低下”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争议的焦点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解决通货膨胀和国有经济衰退并存的难题。讨论中大体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经济秩序混乱、经济结构恶化和经济效益低下是前一阶段“改革急于求成”和“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造成的，主张重新集权和加强计划管理来加以解决；另一种意见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旧体制、粗放增长方式的惯性与双重体制并存，主张进一步改革，变旧体制为新体制，变双轨制为单轨制，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辅之以国家的宏观调控及产业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喜的是这次讨论比过去更加深入。1992 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谈话后，人们的认识趋于一致。作为 1989—1992 年大讨论的总结，体现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正如江泽民主席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所指出的那样：“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早在

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地提出，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果还不明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①

此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引起了广泛重视。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也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农业增长方式问题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本课题的研究主题

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业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三农”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变革原有的农业增长方式，既是农业、农村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与变革农业经济体制一样，变革农业增长方式本身并无现存的经验和模式可资照抄照搬，它需要人们去勇敢地探索、细心地总结和积极地创新。

譬如，由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本身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变革，所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农业生产力本身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在目前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哪些因素在阻碍着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力？

再如，由于农业和农村改革远未大功告成，农业和农村生产关系制约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还十分突出。但农业和农村生产关系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在目前的农业和农村生产关系

^①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中主要又是哪些因素在阻碍着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怎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又如，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发端于我国山东而在其他地区渐成普遍之势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否就是实现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形式。

对于上述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同志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仁已作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讨，形成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值得借鉴的模式，为推进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关农业增长方式的理论探讨还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在有关理论探讨中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和空白点，诸如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在当前是否具有紧迫性，又是否具有可能性？如何正确理解农业增长方式的含义？如何理解农业增长方式的特点？如何正确理解“粗放”与“集约”在农业增长方式中的含义？对农业增长方式应如何进行分类？怎样衡量农业增长方式是否已经转变以及转变的程度？国外的农业增长理论能为转变我国农业增长方式提供哪些借鉴意义？怎样正确理解加速农业科技进步、积累人力资本、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推进农地规模经营、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经济体制转轨、实现农业国际化等措施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中的重要作用、作用机理及其实现途径？农业增长方式在历史上的运动轨迹是怎样的等等。因此，完全有必要针对上述一些模糊认识和空白点，对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问题作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探讨。

本书选择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作为研究主题，旨在借鉴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我国正在实施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战略为主线，对农业增长方式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基本途径等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研究。

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看到的，农业增长方式问题本身是一个相当广泛而复杂的课题，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问题，本书仅就其中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作一个初步的研究，其中肯定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疏漏。

三、本课题的研究动态

“农业增长方式”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1995年9月）之前，不过，其含义并不明确。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农村研究室课题组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出现了“农业增长方式”这六个字，但该文所谓“农业增长方式”与本书所讨论的“农业增长方式”不是同一概念。^①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任务，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国民经济“两个根本性转变”本身就包含着实行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此，人们开始注意研究农业增长方式转型问题。1995年12月14日《农业经济问题》编辑部邀请在京部分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座谈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冯海发先生提出：“农业也要转变增长方式”，“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改变，我国农业就不会有出路。”《求是》杂志于1996年第1期发表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文章《农业发展要注重转变增长方式》，《农业经济问题》在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23

^①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农村室：《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增长方式》，《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第4期；该文还收入郭书田主编：《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